

《大学》诚信思想精蕴及其当代价值

王公山, 陈修亮

(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摘要〕《大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篇集中论述儒家的伦理政治学说的著作。《大学》认为, 治国应以“修身”为本, 而“修身”又以“诚意”为本, “为民父母”的伦理基础是“诚其意”, 诚信教育的人格前提是“毋自欺”。所论对当代探讨诚信缺失的社会根源以及创建以人为本的政治理念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大学》; 诚信; 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B2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09(2005)03-0115-04

《大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篇集中阐发儒家的伦理政治学说的著作。作为一篇伦理政治学著作, 《大学》以其独特的方式论述了个人修养与国家政治的关系, 提出了“修”、“齐”、“治”、“平”的著名论题, 认为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和基础, 上自天子下至庶人, 都应以修身为本。修身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内容就是培养诚信的品德。围绕着诚信问题, 《大学》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探讨, 它所阐发的诸多思想观点, 在今天看来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一

《大学》认为, “诚其意”是最重要的修身方法。《大学》的作者发现, 为了获取某种利益, 人们往往言行不一, 阳奉阴违, 这些不诚实的行为严重妨碍了人们之间的正常交往, 于是郑重地提出了“诚其意”的主张。“诚其意”就是“毋自欺”。“意”是人的内心活动, “诚”是真实不伪, 即内心活动与外在表现彼此一致。内心所想不与言行相违, 言语表达不与实际行动相悖, 这就是《大学》所说的“毋自欺”。

同时, 《大学》作者发现了这样一种现象: “小人闲居为不善, 无所不至, 见君子而后厌然, 揜其不善而著其善。”即大庭广众之下, 小人往往会豪言壮语, 积极为善, 而私底下却肆无忌惮, 无所不为。这是一种典型的伪善, 是“欺人”行为。无论是“自欺”还是“欺人”, 《大学》认为都是不诚不善的表现, 都会危害社会的正常秩序, 即如前贤所说: “自欺与欺人, 势相因, 始自欺, 终必至于欺人。”^[1] 为了避免“自欺”与“欺人”, 《大学》倡导人们“慎独”自律。

“慎”是恭谨之意; “独”有两个含义: 一是单人独处的具体方位, 一是内心活动的状态。“慎独”的本质内涵就是在任何状态之下都应诚实无欺。它不仅要求人们根绝欺骗他人的行为, 而且要求人们遏止欺骗他人的念头。这是一个极高的境界。人们在监督之下, 往往还能循规蹈矩, 失去监督则不免放纵自己。但任何监督都有漏洞, 任何机制都有缺陷, 这就为人们的“自欺”与“欺人”提供了生存的土壤。这是现代法治社会都无法彻底解决的难题。因此, 要“诚其意”, 靠外部压力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 内在自觉才是实现“诚其意”的必要条件和可靠保证。从这方面说, “慎独”自律不失为一种理想的“诚己”方法。

二

《论语》中就曾论及诚信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意义。《颜渊》篇记载, 子贡向孔子请教政事, 孔子回答说: “足食, 足兵, 民信之矣。”子贡接着问: “必不得已而去, 于斯三者何先?” 孔子回答说: “去兵。”又问: “必不得已而去, 于斯二者何先?” 得到的回答是: “去食。”孔子用一句在后世影响甚大的话为之注解: “自古皆有死, 民无信不立。”这种“去兵”、“去食”、“存信”的思想见解开了我国古代倡导诚信的理论先河, 《大学》以诚为本的治国理念便是在其基础上的进一步阐发。

《大学》的“三纲领”表明了治国以修身为本的内涵。“三纲领”即“明明德”、“亲(新)民”、“止于至善”。“明明德”就是彰明其至德, 即通过后天的

三

学习,彰明人类先天固有之至德;所谓“亲(新)民”,意思是说不仅自己要明其至德,还要推己及人。显然“明明德”与“亲(新)民”都不仅仅是一种个人行为,还包含由己及人的社会政治理念。但“明明德”与“亲(新)民”并不是最终目的,“止于至善”才是其终极目标,是一切道德的归宿。即通过修身,彰明己有之至德,而后影响别人,使之摈弃陋习,养育新德,最后共同到达“至善”的境界。《大学》认为“物有本末,事有终始”,又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句中所说的“本末”,具体到修身和治国而言,“本”就是指修身,“末”则是指治国。由此可见,“三纲领”的核心诉求并非在于外部的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功,而是通过修身养性彰明至德,再用“絜矩之道”“刑于寡妻,至于兄弟”^[2](《国风·思齐》),从而使社会所有成员共同达到“止于至善”的道德境界。

治国以修身为本,而修身又以“诚意”为本。《大学》阐发的主要内容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宋儒所说的“八条目”。“八条目”中,“诚意”占据着特殊重要的地位。“格物”、“致知”属道德的认知范围,是道德知识的储备阶段,朱熹称为“知之始”;“诚意”、“正心”是道德的实践阶段,朱熹称为“行之始”^[3](卷15)。“意诚”是“心正”的先决条件,即《大学》所谓“意诚而后心正”,心意不诚,为了点滴私利而苟且取容,阿谀逢迎,背信弃义,不算“心正”。“心正”是“身修”的先决条件,即《大学》所谓“心正而后身修”,心意不正,党同伐异,嫉贤妒能,偏私妄为,不算“身修”。从这个意义上说,“诚意”为“修身”之本。因此,宋人黎立武云:“夫修身,本也;诚者,又修身之本也。”^[4]清代李光地写道:“自身、家而国、天下,盖有言行坊表之着,纪纲法度之施,然非诚则无所以行之。故曰:‘诚者,圣人之本。’又曰:‘王道本于诚意也。’”^[5](《大学篇》)《大学》强调,通过“诚”已达到“诚”人的目的,这和孔子所说的“修己以安人”^[6](《宪问》)阐发的是同样的道理,都是要求君子之人彰明自己固有之善德,运用善德去感化百姓并更新他们的品德,然后共同达到至善的境界。因此,李光地引述姚江之的话说:“《大学》只是诚意,诚意之至,便是至善。”^[5](《大学篇》)《大学》的“止于仁”、“止于敬”、“止于孝”、“止于慈”、“止于信”,都是“诚意之至”在某一个侧面的具体化,因此是至善的体现。

以诚为本的治国理念,决定了“为民父母”的施政方略。《大学》要求统治者像父母对待子女一样对待黎民,“‘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像保护子女一样保护黎民,“《康诰》曰:‘如保赤子。’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如保赤子”皆出于衷心之所诚,即是说,“为民父母”的施政方针,其提出的前提是统治者对待黎民百姓态度须真诚,一切具体的规划也都应建立在关爱与保护黎民百姓的内心之“诚”的基础之上。

首先,统治者要有“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的民本意识。统治者应以好民所好、恶民所恶为原则,一切治国齐家方案的制定都以百姓的福祉和长远利益为根据,而不应为了图谋私利,置民生民利于不顾。要达到如此境界,《大学》认为,当政者有必要做到如下几点:

第一,树立“以能保我子孙黎民”为准则的人才选拔观。选贤任能,自古就是治国平天下的大事,《尚书·大诰》曰:“爽邦由哲。”《论语·泰伯》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孟子·滕文公上》云:“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很能说明这个道理。《大学》提出的选拔治国之才的标准是必须有利于维护子孙后代和黎民百姓的利益。依此原则,当政者在选拔人才时,应该摒弃偏私、豁达大度、包容一切。篇中写道:“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实能容之。”就是说,看见别人有才能,就像他自己有那种才能一般;看见别人英俊聪明,心里喜爱,不但能像从他的口里称赞的一样,而且确实能够容纳对方。《大学》作者认为,这才是真正的为国负责、“为民父母”的态度。相反,当政者如果出于私心邪念,为了保住尊位,千方百计排除异己威胁,“人之有技,媚疾以恶之;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通”,这是假公济私,绝不是为国负责、“为民父母”的态度。这样的人不仅不能保护子孙后代和黎民百姓,而且是国家的祸患。

第二,树立“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的经济伦理观。《大学》作者认为,国家的兴旺,不在于财富的富足,而在于正义的昌明,所以,国家必须正确地看待物质利益,妥善地管理物质财富。篇中围绕物质财富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探讨,提出了若干具有朴素辩证特点的思想主张,具体说来就是:其

一,“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大学》反对为追逐财富而违背人类道德的做法,认为“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即用不正当的手段获取的不义之财,终究会以非常规的形式丧失,对于君子之人来说,修养美德是根本,而得到财富只是次要的事情,财富只是为人的生存服务的,因而不应当把它视为追求的终极目标。《大学》还指出:“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同样强调了道德的根本性地位和作用。其二,“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就是说,财富的多寡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只要一方面把尽可能多的人力投入到生产中,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劳而食者的数量;另一方面力行节俭,合理安排支出,就能达到“财恒足”的目的,造福于国家和人民。其三,“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就是说,财富聚集到少数人手里,国家就会失去民心;财富分散到千家万户,国家才有凝聚力,人民才拥护,社会也才会稳定。为了避免“财聚则民散”的人民离心离德、国将不国的情况发生,《大学》提出了警惕“聚敛之臣”的主张。《大学》认为,“聚敛之臣”都是小人,他们名义上是“长国家而务财用”,实际上是巧立名目算计百姓,以迎合君上的贪财之心,从中谋取自己政治和经济上的私利。上行下效,如此敛财,不仅直接损害百姓利益,而且会严重腐蚀社会道德,破坏社会规则,瓦解统治基础。因此,《大学》指出:“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因为盗贼侵夺的只是一家一户之财,而“聚敛之臣”却使全社会的黎民百姓遭殃受害,如果任其肆行,国家将“菑害并至”,到了那个时候,“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

其次,统治者要有“如保赤子”的爱民情怀。《大学》“为民父母”的施政方针,以保护和体恤黎民为宗旨,因此,《大学》所倡导的统治者对待百姓的态度就是“如保赤子”。“如保赤子”语出《尚书·康诰》,其基本要求是“惟民其康乂”,即对黎民百姓尽心抚养,使他们免受任何伤害,健康平安。《大学》在关爱民生的同时,也强调对民众的引导和管理,不过这种引导和管理,注重的是统治者率先垂范的一面而不是对民众规范约束的一面。“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是《大学》的作者最为推崇的治国平天下之道,所以篇中把统治者的思想行为“其为父子兄弟足法”放到了首要的位置,然后才提出“而后民法之”,从而实现社会的治理。通观整篇《大学》,它虽围绕伦理政治展开论述,却全无“统治”意义的字眼。“齐家”、“治国”、“平天下”诸词中,

“齐”、“治”、“平”都没有统治之意。“齐”和“治”是一个意思,都与“乱”相对,说的是使“家”、“国”有秩序;“平”是平静,说的是使天下万事万物及万民都有定位,各安其位,则天下太平^[7]。那种以百姓为“黔首”,以处理国政为“牧民”,把国家作为镇压百姓的工具,视百姓为任意宰杀的牲畜,这样的观念在《大学》里是不见的。

四

《大学》很重视对国民的诚信教育,并且形成了一套完善的教育方案和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具体而言,《大学》把培育人的“至善”之德、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道德教育的终极目标,把“明明德,亲(新)民,止于至善”作为德育教育的具体步骤,“诚意”、“正心”当然是“至善”的核心内容和通向“至善”之德的必经之路。

首先,重视道德主体的自我培育。《大学》把道德主体自我培育的方法称为“絜矩之道”。篇中云:“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絜”是度量之意,“矩”是量度方形的器具。“絜矩之道”就是时时用社会价值尺度来约束自己的言行,并从他人的角度来考察自身的言行与动机的合理性。如果讨厌上位之人言不由衷,那么自己就应以此心推测下属之心,然后引以为戒,不敢不对下属推心置腹;如果自己厌恶下属欺上瞒下,自己就应该以此心推度上司之心,不敢对上司口是心非。依此类推,在社会交往中,时时用社会价值尺度来纠正、约束自己的言行,使之符合社会规则。其实广义的“修身”就是通过自我约束、自我教育,使自身道德行为和价值观念不断修正和完善,并逐渐与社会规范接轨,最终得到社会认可的一个过程。

其次,上行下效的教化方式。在我国诚信思想史上,提倡使用上行下效的方法进行诚信教育的先例还是很多的,诸如《诗经·曹风·鸣鸠》的“其仪不忒,正是四国”、《论语·颜渊》的“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老子·第二章》的“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等等。但真正从理论上比较具体地阐发上行下效的诚信教育方式的论著,应首推《大学》。《大学》特别注重居于高位者的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对周围所产生的影响,并就此作了说明:其一,家长厉行诚信对家人具有直接示范和诱导作用。《大学》云:“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

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认为“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在《大学》的作者看来,如果能让周围的亲人不撒谎、不欺骗,当务之急就是做家长的树立起诚信的榜样,否则,一切都是空谈。如果家长言行一致、诚实公正,妻子儿女、兄弟姐妹就会模仿效法,就会形成纯朴真诚的家风,尔后扩散到社会,形成朴质民风。这就叫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家信一国兴信。其二,当政者厉行诚信有助于全社会诚信风气的形成。《大学》云:“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同理,上修诚信之行而下无欺诈之言。这就是“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的道理。相反,假如“无诸己而后非诸人”,具体到当政者来说,他自己不能诚其意、正其心,背弃诚信之道,自作聪明地“掩其不善著其善”,却要求百姓诚实守信,结果只能是“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他落得个众叛亲离、孤家寡人的下场是必然的。

五

《大学》的道德理想虽然是先秦社会生活的反映,但其中所蕴涵的道德理念和人文精神,非但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过时,相反还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更加体现出其独特的价值和魅力。当前,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社会的过程中,挖掘诚信这一传统道德资源,对强化公民的道德意识,增强民族的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首先,修身要以诚信为本。个人诚信是社会诚信的基础,它直接反映一个社会的信用水平。因此,提高公民的道德素质,培养公民的守信习惯,增强公民的诚信意识,是当代中国诚信建设的关键所在。《大学》把修身作为目的,把至善至诚作为人生的最高境界,把“慎独”自律作为通向至诚的手段,强调“毋自欺”,不欺人,在任何地方都诚实如一,甚至把不诚的念头都当成罪过,把“诚”转化成人内在的自觉性,使欺骗的动机失去生存的土壤,虽然带有道德形而上的色彩,但从建设诚信中国的长远目标来看,无疑是具有重要借鉴价值的。因为如果只把诚信作为一种短期行为,一种策略或手段,其作用是有限的,发生在美国的“安然事件”就是一个佐证。只有使诚信成为人的一种内在自觉性,甚至成为一种信仰,就像古罗马政治家西塞罗所倡导的“不说一句假话,不留一句真话”^{[8](P226)},它的作用才会持久而强烈。

其次,为政也要以诚信为本。《大学》明确指

出:“君子先慎乎德。”又说:“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就是说,当政者必须以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为急务,只有做到了忠诚守信,才能长保禄位,如果骄傲自满、盛气凌人,必定会栽跟头。当政者忠诚守信,应当体现在为政的具体实践中,其基本要求是:第一,言行一致,即言论与行动一致,不弄虚作假,不言而无信;第二,表里一致,即不能心里想的是一套,实际做的却是另一套;第三,前后一致,即信守诺言,而不朝令夕改。如果当政者不论大事小事、对人对己,不论对上级、对下属还是对工作、对事业,都能做到诚信不欺,就一定能赢得群众的信赖,就能产生强大的吸引力、感召力和说服力;反之,假如为政不诚、言而无信或轻诺寡信,虽可哗众取宠于一时,但最终必将失去民心。

再次,诚信教育应当从我做起。我们应该重视对年轻一代的诚信教育,但我们更应该对自我的行为进行约束和控制。《大学》的修身之道要求人们必须从“齐家”开始:“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就是说,居于高位之人所提倡的道德品质,他自己首先必须躬行践履,从而来感召和影响百姓。更具体些说就是:要想使公众遵纪守法,自己应带头照章办事;要想使公众爱岗敬业,自己必须恪尽职守;要想使公众忠诚守信,自己必须率先垂范。当政者肩负着塑造百姓品德的历史责任,如果他们假话连篇,欺上瞒下,却责令众人诚实守信,“民不从”“不亦宜乎”?民以吏为师,《大学》云:“‘赫赫师尹,民具尔瞻。’有国者,不可以不慎,辟则为天下僇矣。”朱熹注解:“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慎。若不能絜矩而好恶徇于一己之偏,则身弑国亡,为天下之大戮矣。”可见当政者以诚待人、以信率人是多么的重要。

参考文献:

- [1] 景星. 大学集说启蒙[M].
- [2] 诗经[M].
- [3] 朱子语类[M].
- [4] 黎立武. 大学本旨[M].
- [5] 李光地. 榕村集[M].
- [6] 论语[M].
- [7] 叶秀山. 试读大学[J]. 中国哲学史, 2000, (1).
- [8] [英] 威廉·葛德文. 政治正义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作者简介: 王公山(1966—), 男, 山东平度人, 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博士生, 临沂师范学院讲师, 主要从事中国传统经学研究。

责任编辑: 裴传永